

## 海外观察

## 政府干预

## 能缩小贫富差距吗

□金晓晓

经济发展到底会缩小贫富差距还是扩大贫富差距?是否可以通过政治手段来避免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现象?贫富差距究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阵痛,还是人类社会难以消除的顽疾?

今天,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贫富差距都是一个热门话题。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两个焦点话题就是:日趋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以及是否应通过政府干预来解决这一问题。

以美国总统奥巴马为代表的美国左翼认为,应增加税收和政府转移支付来遏制贫富分化;而以共和党为代表的右翼则认为,应通过减少税收和缩小政府规模来促进经济活力。

左右两边互不妥协,因为双方都认为自己有理。右翼秉持传统的经济学观点,认为贫富差距是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因为这种差距会激励贫困者更加发奋工作。因此,右翼反对政府介入干预。代表人物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obert Lucas,他在2003年写道:“在威胁健康经济的所有不良趋势中,最具诱惑力也最有害的,就是对分配问题的关注。”

欧债危机宣告了欧洲福利国家的失败,更让不少人相信,过于追求平等的社会可能丧失经济活力。因此,在经济活力和不平等的天平上,右翼明显倾向于前者,将不平等视为一种经济发展的“必要的恶”了。

而左翼认为,贫富分化是美国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如果任由贫富分化发展下去,将导致社会动荡,最终阻碍经济发展。

一些左翼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更从理论角度论证贫富分化有碍经济增长的机理。在2012年出版的《不平等的代价》中,他警告说,收入不平等将导致机会不平等,穷人无法发展其潜能,进而降低经济竞争和活力,并可能导致裙带主义等一系列问题。此外,不平等还将引发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矛盾,激发民粹主义思潮,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对美国不平等现象的一个警告。

要判断哪边说得有道理,首先需要搞清楚经济发展和贫富差距的关系。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Simon Kuznets在1955年提出了著名的Kuznets曲线理论,认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收入差距会呈现倒U型走势,即在工业化初期收入差距会越来越大,而在工业化完成之后收入差距会逐步缩小。

这一理论的确反映了二十世纪前半叶的真实情况,但此后Kuznets曲线失灵了,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贫富差距重新开始扩大,其轨迹已经从一个倒U变为N。

在美国,从1980年至今的三十多年来,最富有的1%人的收入(含资本收益)占美国居民总收入的比例从10%翻了一番至20%,恢复到了一百年前水平。更离谱的是,最富有的0.01%的人——全美大约1.6万户家庭的收入占居民总收入的比例翻了五番,从1%增加到5%。

不只是美国,从1980年至今,全球大多数国家,无论美国、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还是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都呈上升趋势。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导致Kuznets曲线失灵的许多新因素已经出现。其中最为突出的几点是全球化、金融发展和科技创新。全球化令低端工作机会从发达国家转移至发展中国家,恶化了发达国家中低收入阶层的处境。而金融的快速发展更是催生了以前难以想象的超级富豪,美国前25名对冲基金经理挣的钱比标普500成分股企业全部CEO加起来的还多。而科技创新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在下降,受害的仍是穷人。

此外,家庭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可能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美国天主教大学教授Jerry Z. Muller在2013年第二期《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说,男性和女性越来越平等,导致优秀的女性夺走了越来越多能力较差男性的工作,同时优秀女性往往倾向于嫁给更优秀的男性,导致在家庭收入方面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

家庭的代际影响也比以往更加明显。如今,美国名牌大学里只有8%的学生是来自收入低于中位数水平的家庭。Muller认为,教育上的机会平等可能意味着结果不平等,因为如果按照同样的遴选标准,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往往比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更有优势。

可见,当今的贫富分化问题,很难归咎于某些不合理的经济政策,相反这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归根结底,不平等源于人天然禀赋和家庭出身的差异,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和科技进步放大而非缩小了这一差异。

政府在处理不平等问题时,必然遭遇结果平等和机会平等的冲突。机会平等往往令结果更不平等,而采取平权措施来追求结果平等,无疑将损害经济效率。

因此,关于美国贫富分化的左右之争难以有一个定论。对右翼来说,民众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说明,不管其是否乐意,贫富分化问题都已经在政治议事日程表上占据了靠前位置。而对左翼来说,指望通过政府干预来阻止贫富分化,或许难获成功。

## 海外聚焦

## 能缩小贫富差距吗

□金晓晓

经济发展到底会缩小贫富差距还是扩大贫富差距?是否可以通过政治手段来避免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现象?贫富差距究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阵痛,还是人类社会难以消除的顽疾?

今天,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贫富差距都是一个热门话题。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两个焦点话题就是:日趋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以及是否应通过政府干预来解决这一问题。

以美国总统奥巴马为代表的美国左翼认为,应增加税收和政府转移支付来遏制贫富分化;而以共和党为代表的右翼则认为,应通过减少税收和缩小政府规模来促进经济活力。

左右两边互不妥协,因为双方都认为自己有理。右翼秉持传统的经济学观点,认为贫富差距是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因为这种差距会激励贫困者更加发奋工作。因此,右翼反对政府介入干预。代表人物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obert Lucas,他在2003年写道:“在威胁健康经济的所有不良趋势中,最具诱惑力也最有害的,就是对分配问题的关注。”

欧债危机宣告了欧洲福利国家的失败,更让不少人相信,过于追求平等的社会可能丧失经济活力。因此,在经济活力和不平等的天平上,右翼明显倾向于前者,将不平等视为一种经济发展的“必要的恶”了。

而左翼认为,贫富分化是美国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如果任由贫富分化发展下去,将导致社会动荡,最终阻碍经济发展。

一些左翼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更从理论角度论证贫富分化有碍经济增长的机理。在2012年出版的《不平等的代价》中,他警告说,收入不平等将导致机会不平等,穷人无法发展其潜能,进而降低经济竞争和活力,并可能导致裙带主义等一系列问题。此外,不平等还将引发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矛盾,激发民粹主义思潮,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对美国不平等现象的一个警告。

要判断哪边说得有道理,首先需要搞清楚经济发展和贫富差距的关系。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Simon Kuznets在1955年提出了著名的Kuznets曲线理论,认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收入差距会呈现倒U型走势,即在工业化初期收入差距会越来越大,而在工业化完成之后收入差距会逐步缩小。

这一理论的确反映了二十世纪前半叶的真实情况,但此后Kuznets曲线失灵了,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贫富差距重新开始扩大,其轨迹已经从一个倒U变为N。

在美国,从1980年至今的三十多年来,最富有的1%人的收入(含资本收益)占美国居民总收入的比例从10%翻了一番至20%,恢复到了一百年前水平。更离谱的是,最富有的0.01%的人——全美大约1.6万户家庭的收入占居民总收入的比例翻了五番,从1%增加到5%。

不只是美国,从1980年至今,全球大多数国家,无论美国、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还是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都呈上升趋势。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导致Kuznets曲线失灵的许多新因素已经出现。其中最为突出的几点是全球化、金融发展和科技创新。全球化令低端工作机会从发达国家转移至发展中国家,恶化了发达国家中低收入阶层的处境。而金融的快速发展更是催生了以前难以想象的超级富豪,美国前25名对冲基金经理挣的钱比标普500成分股企业全部CEO加起来的还多。而科技创新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在下降,受害的仍是穷人。

此外,家庭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可能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美国天主教大学教授Jerry Z. Muller在2013年第二期《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说,男性和女性越来越平等,导致优秀的女性夺走了越来越多能力较差男性的工作,同时优秀女性往往倾向于嫁给更优秀的男性,导致在家庭收入方面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

家庭的代际影响也比以往更加明显。如今,美国名牌大学里只有8%的学生是来自收入低于中位数水平的家庭。Muller认为,教育上的机会平等可能意味着结果不平等,因为如果按照同样的遴选标准,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往往比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更有优势。

可见,当今的贫富分化问题,很难归咎于某些不合理的经济政策,相反这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归根结底,不平等源于人天然禀赋和家庭出身的差异,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和科技进步放大而非缩小了这一差异。

政府在处理不平等问题时,必然遭遇结果平等和机会平等的冲突。机会平等往往令结果更不平等,而采取平权措施来追求结果平等,无疑将损害经济效率。

因此,关于美国贫富分化的左右之争难以有一个定论。对右翼来说,民众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说明,不管其是否乐意,贫富分化问题都已经在政治议事日程表上占据了靠前位置。而对左翼来说,指望通过政府干预来阻止贫富分化,或许难获成功。

□本报记者 杨博

美国“股神”巴菲特等待许久的并购扳机终于打响。2月中旬,巴西私募股权公司3G资本联手巴菲特,以28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全球食品业巨头亨氏集团,创下食品行业最大手笔的收购。在巴菲特光芒闪耀的同时,这宗交易也让幕后神秘操盘手、去年底晋升为巴西新首富的豪尔赫·保罗·雷曼(Jorge Paulo Lemann)显露真容。

## 晋升巴西新首富

据2012年的福布斯富豪榜显示,现年74岁的雷曼身家约为120亿美元,在全球富豪榜上位列第39位。另据彭博去年12月的最新统计,由于旗下啤酒公司股价上涨,雷曼的身家在去年底已经达到189亿美元,超过商品大亨埃克·巴蒂斯塔,成为巴西新首富。其在全球富豪榜的排名也升至第36位。

雷曼1939年出生于巴西里约热内卢,是一位瑞士移民的后代。1961年从哈佛大学毕业,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后加入瑞士信贷公司任培训生。起初事业并不顺利,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他先是失去了在巴西日报撰写股市专栏的第一份工作,后来又因为股灾丢掉了经纪人的饭碗。

1971年,雷曼回到巴西,与人联合创建了投资银行机构Banco Garantia,试图模仿高盛集团的合伙人模式,将这家机构打造成为巴西的顶级投行。当时,他们支付了80万美元在里约热内卢证券交易所买到一个席位,孰料几周后市场崩盘,大跌近60%,雷曼及合伙人几乎赔掉了全部资金。

但不久后,这家投行的业务就开始稳健反弹。在雷曼和特利斯·斯库彼拉组成的“铁三角”的精心打造下,Banco Garantia逐步变身为巴西最具盛名和创造力的投行,被福布斯称为

## 联手“股神”收购亨氏

## 巴西新首富显露真容



CFP图片

巴西的高盛”。后在1998年,雷曼将这家投行以6.75亿美元的作价卖给了瑞士信贷。

一直以来,雷曼的生活都低调而神秘。特别是对于他的早年经历,几乎全部围绕在他身为巴西顶级网球运动员的报道上。资料显示,雷曼曾参加过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五次参加巴西国家联赛,两次参加戴维斯杯比赛。

此外雷曼还十分关心教育事业,已经捐助数百万美元用于赞助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

## 啤酒业大展拳脚

在出售银行业务后,雷曼和他的“铁三角”阵营将注意力更多转向并购市场,并进军啤酒业。起初他们买入巴西啤酒和饮料公司美

洲饮料的股票,获得了该公司的控制权,并通过建立强大的管理团队,以及着力削减成本,推动这家公司的业务迅速拓展。这家公司即是南美洲最大啤酒制造商安贝夫(AmBev)的前身。

在雷曼的团队治理下,安贝夫如同龙卷风一样扫荡了整个南美洲。到2008年,安贝夫的税前利润已经达到27亿美元,占其销售收入的35%,掌握着巴西65%的啤酒市场和阿根廷80%的啤酒市场,并在巴拉圭、乌拉圭和玻利维亚处于垄断地位。

2004年8月,安贝夫宣布收购比利时的英特布鲁公司,合并后的英博集团(InBev)股价在2005年大幅上涨了40%。随后在2008年,英博集团宣布斥资500亿美元收购美国老牌啤酒商安海斯-布希,组建百威英博集团(AB InBev)。在这场震惊全球的具有高度争议的恶意并购案后,雷曼将手中那家巴西小啤酒厂最终推向了全球最大啤酒制造商的宝座,他本人也从此成为“啤酒业之王”。

目前百威英博已成为全球五大消费品公司之一,旗下经营着300多个品牌,其中包括百威、时代、贝克啤酒等全球旗舰品牌。雷曼现持有百威英博10%的股权,这也是他个人的最大资产。在收购并创建百威英博集团后,受到啤酒需求稳步上升的推动,雷曼和他的“铁三角”的身家都上涨了超过50%。

在啤酒行业崭露身手后,雷曼的眼光拓展到更广泛的食品行业领域。通过他于2004年创建的私募股权公司3G资本,雷曼的“铁三角”于2010年以4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美国快餐连锁店汉堡王(Burger King)并将其私有化。在被3G资本收购前,汉堡王已经连续两年销售增长放缓,利润下降。而3G资本的收购报价,较当时该

3G资本入主汉堡王之后,对其进

行了外科手术式的变革,在原有菜单中加入沙拉和冰沙等项目,试图与麦当劳进行竞争。短短两年后,经过重组的汉堡王于2012年重新上市,股票代码为“BKW”。2月中旬公布的最新财报显示,该公司去年第四季度利润同比增长94%,达到4860万美元。

## 伴“股神”再次出手

2月中旬,全球食品业又传出爆炸性新闻,食品巨头亨氏集团宣布美国“股神”巴菲特联手3G资本,斥资230亿美元收购该集团,此次收购整体规模达到280亿美元,创下全球食品行业最大手笔的收购。

在与巴菲特联合收购亨氏集团的交易中,3G资本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报道称,尽管巴菲特称自己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对亨氏产生了兴趣,但知情者表示此次收购的发起方实际上是3G资本。自去年12月开始,3G资本就开始与巴菲特商讨这项收购计划,在本次收购中,巴菲特执掌的伯克希尔公司提供了约120亿美元的资金,而收购后负责管理亨氏的将是3G资本。因此,可以说“股神”只是搭上了顺风车。

尽管从巴西起步,但目前的3G资本对美国多家上市公司都有投资。美国媒体报道称,雷曼与巴菲特有着不错的私人交情,这无疑令雷曼的公司在美国市场获得了一张人情“信用卡”。不止如此,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女婿也是3G资本的合伙人之一。

业内人士认为,雷曼的业务扩张采用的是标准的杠杆收购策略,即动用杠杆进行收购,然后清理旧的管理团队,大幅削减成本,动用所未有开发的定价空间,然后利润循环投入用于下一次收购或者品牌建设。其每一次收购的目标,基本都是食品饮料行业的龙头,但因为家族式管理的沉疴而创新动力不足,长期表现平平。

□金融城传真

## 英镑将继续走软

□本报记者 王亚宏 伦敦报道

其实对于金融城的人来说,对于英国被调降信贷评级的预期,就像期盼阁楼上落下的第二只靴子一样,人人都知道它会落下,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一周前,国际评级机构穆迪终于亮出了这张牌,将英国的本币政府债务评级由最高AAA评级下调一级至Aaa。英国自1978年起一直获得穆迪及标准普尔的顶级信贷评级,这是英国首次失去权威评级机构的最高评级。

过去两年,欧元区国家都吃尽了美国信用评级机构落井下石的苦头,而这次可能轮到英国。英国去年的主权债务净额相当于GDP的68%,虽然与“欧猪四国”相比尚低至红线,但信用评级机构对英国政府采信的经济政策是正确的。

英国政府一直将减少赤字和债务列为经济政策的优先选择,卡梅隆自从上台以后就高举紧缩旗帜,但收效甚微。今年英国政府的赤字仍将占到GDP的4.3%,即使仍未摆脱欧债危机的南欧国家的成绩单也比英国强,最差的是日本。

## 华尔街夜话

## 在美国看牙

□本报记者 樊宇 华盛顿报道

在国内,不少人谈看牙色变,不仅费时还费钱。笔者到了美国才知道,看牙昂贵的程度在美国有过之而不及。在美国有一种说法是,如果没有医疗保险,想看牙你就等着破产吧。虽有点夸张,但不无道理。有统计显示,美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看不起牙。

美国人重视牙齿保健是出了名的,即便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微笑时也能露出一口让人羡慕的牙齿。拥有固定工作的美国人除了普通的医疗保险外,一般都拥有专门的牙医保险。每个月缴纳一定的费用,就能享受免费的常规检查和一年两次的洗牙服务,但牙齿治疗的减免额度有上限,超出部分由个人支付,一些非常规项目也需要患者自行承担一定的比例。

在美国,大大小小的牙医诊所随处可见。看牙不能贸然前往,而是需要预约,赶上诊所生意火爆的时候,若没有急症,就只能按部就班地等待空缺。

笔者目前因为牙齿疼痛难忍而不得

当笔者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按照预约时间来到一家朋友推荐的诊所时,发现诊所的陈设整洁舒适,十分人性化,没有冷冰冰的感觉,如酒店般温馨。

在见到医生之前,需要填写一份详细的个人信息单,包括病史、药物过敏史等众多项目。和医生初次见面,他的轻言细语和温和的笑容缓和了我的紧张情绪。在问询我的症状之后,他建议我做一次口腔的全面X光检查,以便更加清楚地了解牙齿状况。这样的检查固然比较方便,但是价格也不菲,大概在300美元左右。

五分钟左右,口腔的X光片就被传到我眼前的电脑屏幕上。医生标示出有问题的牙齿后,仔细地向我说明了需要采取的治疗。事实上,情况比预想要严重,一颗蛀牙需要拔除,还有其他两颗牙齿需要修补。

看着我一脸的惊讶,医生再次跟我解释需要拔牙的原因,并告诉我,如果觉得突然,可以过几天做好心理准备了再来看,但宜早不宜迟。他的周到和温和打消了我心中的疑虑。

询问具体费用后,笔者向医生提及自

己没有购买牙医保险,经过和诊所反复商量,他同意在医药费上给予一定优惠。但即便这样,总费用依然是笔不小的数目。

此后,笔者分两次进行了拔牙和补牙治疗。两次治疗过程中,医生均进行了局部麻醉,这样减轻了患者的疼痛,但也增加了不少费用。治疗完成后,医生给我开了一些抗生素和止痛片,并列出了一长串的注意事项,如有问题,随时电话联系。

听着医生的嘱咐,笔者心里顿时轻松了很多。此番治疗经历改变了我之前对看牙的莫名恐惧,其实医生在治疗过程中对病人感受多一分重视,多一些沟通,就能构建良好的治疗氛围。而且整个治疗过程紧凑有序,免除了患者跑上跑下的劳顿和排队的辛苦。

当然,笔者对美国看牙也有了一更切身的感受。因为病人费用大多由保险公司承担,医生在治疗过程中不用太顾及费用